

经济结构优化: 基于融资制度创新的一种分析

张宗新

摘要: 我国经济结构的症结,在于传统集中型融资体制。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待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创造这一条件的重要切入点,将是改革现有融资体制,通过融资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资本形成与资源配置机制。融资制度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资金导向机制、优化配置机制、产业成长机制、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是依靠金融资源的导向作用发挥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融资制度创新通过一种链式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引导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达到经济结构优化的目的。

关键词: 融资制度 经济资源配置 经济结构优化

一、引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融资体制,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畸形的重要症结。在这一融资体制下,行政性集中管理的资源配置方式,使经济资源、要素禀赋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严重矛盾与冲突,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

本来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主观意图,是从突破资金稀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制约入手,较快地克服经济结构中重工业薄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而在最短时间内达到并赶超发达经济国家的目标。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动员资源和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建立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以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融资体制,使中国经济在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但是,推行这一战略的结果,是资金在各个产业部门和地区的计划配置,未能有效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和规避资金短缺的比较劣势,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扭曲。在改革前的27年间,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工业所占份额持续上升,工业比重从1952年的19.52%上升到1978年的49.4%;工业结构中制造业部门的比例特别高,轻工业比重过低。中国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达到了过高的制造业比重,与此对应的第三产业发展极其不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低。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背离了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给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障碍。

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重复建设、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但是经济结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十五”期间,优化经济结构进行国民经济战略性改组,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线。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传统农业经济和现代城市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基本任务有三个:一是顺利完成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工业低层次劳动资本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转化,实现工业现代化;三是就业比重从一、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转换,实现经济发展与就业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实现这些目标,中国遇到的现实障碍直接来自于两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需要巨额启动资金的来源难题;二是如果能形成有限的资金注入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那么形成一个有效融资制度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在此,本文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分析入手,提出传统的融资制度与之相对应的资本形成机制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现实性障碍。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待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创造这一条件的重要切入点,将是改革现有融资体制,通过融资制度创新形成有效的资本形成与资源配置机制。

二、融资制度创新作用于经济结构的内在机制

在一国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的发展不是平行的,而是在资本推动下主导部门渐次更替的过程,这也标志着现代经济史的历程。只有不断产生有序的产业部门更替,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即通过劳动和资本等一系列要素的部门转移实现产出增加,消除生产和流通中短缺、过剩与低效率,满足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在现代经济中,这种结构调整与资源重新配置表现为资金在不同领域的有效流动,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有序转移。融资制度创新,以资金配置方式促进了这种资源流动的实现。具体而言,融资制度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表现为以下四个层面:

1. 资金导向机制。从动态上说,资金的运用结构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某一时点的产出结构反映着资金的分布状况。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储蓄等于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它是利率机制对储蓄、投资的调节能实现均衡为条件的。然而实际上,储蓄者与投资者在信息上存在非对称性,在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也存在不一致性,利率对资金的导向作用是有限的。基于上述情况,依靠融资制度安排,发挥制度创新对社会资金的导向作用,改变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格局,可以弥补市场自身缺陷,实现融资制度创新对市场机制的部分替代,并以技术创新及其新技术应用作为资金流向的根本指向,以此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正如希克斯认为,这种促使产业结构改变方向的动力,“可以在同一时间、比较适当的时间出现的金融发展中找到可能的答案。”

2. 优化配置机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基本属性是价值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实物流,资本配置决定资源配置。作为实现资本配置手段的融资制度,同资源配置效率有机联系在一起。一个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在资金的导向作用机制下,竞争性的将储蓄资源分配于不同收益率的投资之间,使资金能够按照经济原则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高效流动,从而调整资源配置状态,提高投资效益和要素生产率,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从萎缩部门向新兴产业转移,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可以通过下面传递过程予以解释:融资制度创新—储蓄与投资结构变

化 资金流量结构发生变化 影响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 生产要素部门间流动与重新配置 经济结构优化。

3. 产业成长机制。融资制度创新在产业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促进核心企业的形成。在产业成长中,核心企业不仅能够带来最新的创新成果并促进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且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基础产业和后续产业的发展。核心企业作为产业发展中高增长率的部门,对资本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它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往往因传统融资方式限制而无法实现而受阻。融资制度创新,适应产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资本集中规模,直接支持了核心企业的成长。二是推动主导产业发展。通过建立高效的金融体系,为产业成长提供必要的金融资源配置和重组机制,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以市场化的手段,实现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主导产业的形成和转变,为企业产业发展提供了连接纽带和控制手段,可以打破行业的部门、地区和国界的限制,推动企业向集团化、国际化发展,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三是依靠扩散效应实现产业整合。制度创新要成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支点,本身应具备扩散能力,通过产业链条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真正实现产业整合功能。如果不存在这一必要前提,那么融资制度创新无法有效推动产业成长。

4. 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技术自身的演进,而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关键不在于投资和技术本身,“而在于依托于怎样的制度搞投资”,“如果没有适宜的融资机制,新技术创意就很难通过开发、示范、推广等阶段实现产业化。”不断创新融资制度,可以实现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产业提供风险分担与风险补偿,以降低创业者的投资风险。以产业投资基金为代表的风险投资机构,将较好地适应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高新技术产业对融资的要求,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导入和资金支持,有力推动了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调整 and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三、融资制度创新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引导器

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结构优化的作用,是依靠金融资源的导向作用发挥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融资制度创新通过一种链式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引导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达到经济结构优化的目的。

从动态方面分析,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结构优化功能是依靠产业运动的三种方式实现的。具体而言:

1. 融资制度创新决定着单个产业部门扩张与收缩的运动状态。从单个产业部门看,产业部门产生与发展过程离不开资本的支持。一般来说,融资制度创新引致资本流向新的生产领域,当这些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该部门能够获得高于一般产业部门平均利润水平时,其他部门的生产要素就会向该部门转移,将导致该产业部门迅速扩张。同时,融资制度创新本身是同技术集约化相伴生的过程,必然会导致原有部门生产率提高,该部门有机构成提高,如果这些部门的产品需求弹性较小,这将促使其他生产要素向外流出,尤其是劳动力减少,致使该产业部门规模收缩。可见,融资制度创新能够引起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转移,导致产业部门扩张或收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发展。

2. 融资制度创新决定着优势产业更迭的有序演变。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过程,本身是与该产业的收缩或扩张相联系。根据各个产业发展不同,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低增长部门;二是高增长部门;三是潜在高增长部门。在这三类部门中,高增长部门的地位最为重要,它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霍夫曼将其称为“优势产业”。这三类产业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低增长部门发展减速,被新的高增长部门取

代,在递次的发展阶段中,潜在的高增长产业又将取代原来高增长产业的位置,重新成为新的优势产业。

融资制度创新,必须与这种优势产业的更迭相协调,以金融资源为导向,协同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到优势部门中去,资本与技术较好地结合起来,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随并行,支撑高增长部门快速发展;同时,培育潜在优势产业部门的成长,为优势产业的有序演进提供动力支持,推动产业结构的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

3. 融资制度创新决定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高增长部门的更迭虽然使产业结构变动呈现有序性,但并不一定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因为在特定的经济周期内,由于受高利润率的影响,会出现某些高增长部门,但这些部门并不代表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由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本质上并不是某些生产部门比例的简单变化,而是社会生产率真正提高,技术集约化与生产效率化的过程,即采取先进生产率的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的增加。因此,只有提高整个经济部门的技术集约化程度,才能真正推动经济结构不断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

融资制度创新通过资本的带动力量,使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重新结合,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影响生产要素相对收益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资本与劳动的相对边际生产率,改变产业部门之间的收益平衡状态,使各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首先在优势部门或潜在优势部门迅速、有效积聚,导致主导部门进行有序更迭,然后通过部门之间的技术联系(投入—产出关系)发生扩散效应(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果),来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集约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水平,导致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四、融资制度创新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直接推动力

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实质,是经济资源在各产业部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过程。金融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同时也是结构调整的直接推动力。融资制度创新通过金融资源再配置方式,促进经济资源流动调整,以此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融资制度创新对经济结构优化的推动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资本有序流动推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均衡。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资源配置是通过金融资源市场配置来实现的,资本集聚的规模与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资本流向调整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变动。要改变经济结构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并促使经济结构合理发展,必须通过金融资源的再配置来实现。通过金融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分配,可以建立一些新的产业部门,加强某些薄弱部门的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的不符合生产发展需要的产业结构,建立产业部门之间新的比例关系,实现产业部门均衡发展。

2. 经济资源重新组合实现经济效率提高。如果一国经济结构扭曲且呈刚性,那么大量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将得到不合理的配置,经济运行效率将严重降低。融资制度创新,可以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手段引导经济资源重新组合,将经济结构扭曲的潜在能量释放出来,其根本所在是:第一,资源转移过程中的财力集中以及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为社会劳动的合理分配和节约创造了条件,而这一节约,显然是在经济运行中创造更多价值,是实现更快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如马克思指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第二,转移过程中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之比得到显著改善,即资源的边际生产率提高。第三,由于资源转移是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一定程度上的替代,转移过程中的资金与技术集中,有利于有机构成

提高,从而可以实现技术对劳动和实物资源的替代,产生同量资源投入的高产出增长效果,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

3. 金融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间的互促功能。融资制度的发展与创新,改变生产经营部门的融资结构,通过有效资金配置与其他要素再配置之间的互动功能,促进社会资源优化在众多生产经营部门融资结构变化中得以实现。投资的边际效益提高,金融资源在产业之间进行转移,以再配置资金方式将从替代型产业部门转移出来的金融资源投入到有效的投资上,引致产业结构的变化。在这金融格局变迁过程中,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呈现一种相互促进作用。“分析金融机构对经济的作用时,最相关的金融结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结构的金融工具发行净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率。”

表1 日本金融机构发行率(%)

	1881-1900	1901-1913	1914-1929	1930-1938	1939-1948	1949-1963
(%)	7.7	6.5	14.0	18.4	31.8	29.4

资料来源: [美]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文版,18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从表1、2可以看出,日本产业结构的长期变动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密切正相关性,每一次产业的重大变动,几乎都伴随着一次金融机构发行比率的大幅度提高。这说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金融深化是一个相互支持的同步过程,两者共同支撑着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

表2 日本产业结构的长期变动

	产业构成(%)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880	67.1	9.0	23.9
1920	34.0	26.7	39.3
1940	18.1	38.0	43.9
1946	38.8	26.3	34.9
1950	26.0	31.8	42.2
1960	14.6	36.4	49.0
1975	6.7	36.0	57.3

资料来源: [日]利佐佐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中文版,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五、融资制度创新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切入点

1. 解开资产凝固化的体制性症结,形成经济资源市场化流动机制。经济资源市场化流动,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不健全,在银行信贷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资产质量却一直无法有效改善,大量信贷资产呆滞沉淀,不能及时转移,资产呈现专有化、实物化和凝固化状态,不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资源流动的要求。经济资源不能有序流动,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体制性阻滞。融资制度创新,就是从体制上彻底解开这一体制症结,形成经济资源市场化流动的有效机制。

进行融资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市场型融资制度是推动经济要素市场化流动的最有效机制:(1) 重新塑造商业银行的金融调节功能。经济资源流动能力差,不但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造成巨大潜在金融风险,同时也削弱了银行的金融调节功能,经济结构调整的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能力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为此,必须重视金融杠杆在产业政策实施中的作用,继续保持适当的信贷规模增长速度,以资金的增量调整带动经济结构调整。根据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和产业发展纲要,重点调整信贷投资方向,由外延型、数量型的贷款转向内涵型、质量型的贷款,以健全的投资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2) 发挥资本市场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功能。资本市场作为金融资产供给场所,一方面按照收益性、流动性、风险性要求,促进社会资本流向发展潜力大、成长性高

的产业。特别是发挥股份制度的社会资本聚集功能,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资本规模的要求,培育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具有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升级的效率与效益的内在动力。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功能,实现资产存量按照市场规则有序流动,能有效解决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资产专用性与体制进入壁垒的矛盾,实现社会存量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与调整。(3) 发挥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功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离不开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又是结构调整的重要主体,尤其是我国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目前中小企业却往往由于规模小、存活率低等原因,难以获得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融资的支持,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在此,应结合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战略方针,国有经济退出的竞争性行业与领域,主动让位于中小企业,使中小企业承担起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重要角色。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开辟融资渠道,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发展中小企业为途径,促进经济资源向生产率高的中小企业流动,特别是向大量高科技企业流动。

2. 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促进基础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利用国家信用,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政府集中安排邮政储蓄、国民保险金、金融机构认购的政府保证债券资金等等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到20世纪80年代末,资金规模相当金融规模的1/3左右,财政融资也被称为“第二预算”。而我国改革以来,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低,这必然导致财政投资能力下降。政府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等领域投资不足,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针对这一状况,从20世纪90年中期开始政府充分利用国家信用,发挥财政融资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利用财政资金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1998年,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银行相应增加了1000亿元贷款,重点投向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交通运输和邮电、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环保建设、国家粮食储备库、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程和经济适用房等6大领域。到1998年底,国债项目累计投资3700亿元。另一方面,利用国债贴息技改,促进形成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有效机制。针对我国工业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专门用于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贴息,着眼于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产业结构的升级。支持重点行业,安排了一批对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影响的项目,使不少企业走出了“不技改等死,搞技改找死”的怪圈。1999-2000年,通过安排国债资金195亿元用于技改贴息,拉动投资2400亿元,发挥了国家投资的杠杆效应,起到了对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引导作用。

3. 建立创业投资机制,给予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内容。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而银行资金追求的是稳定收益,政府的资金数量又十分有限,因此传统融资渠道无法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通过融资制度创新,发展风险投资,不仅可以聚集社会资金,而且可以通过组合投资和专家管理来分散、降低投资风险,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效工具。从风险投资者对高风险、高回报的偏好以及高技术产业高成长性的特性看,风险资本已经成为培育高科技企业的主力,有90%的美国高科技企业是按照风险资本模式发展起来的,如英特尔公司、数据设备公司、微软公司等等,正是这些企业将美国经济带入新经济的轨道,成为当前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安排上,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的有关精神,

注重融资制度创新的“两个供给”：一方面注重资金供给，“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信贷的支持作用，积极探索多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另一方面要注重制度供给，通过积极制度创新，“培育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资本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经济社会制度”，“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是推动技术进步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

注释：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文版，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见钱颖一、肖梦主编：《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201、198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为说明这种情况，罗斯托对主导增长部门和主导循环部门进行区分，指出主导部门是引进了创新的生产函数的真正主导部门，而主导循环部门是没有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受高利润率影响的辅助主导部门或派生主导部门。只有前者的更迭，才能带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后者只能支撑特定周期的经济繁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美]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文版，18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载《光明日报》，1999-08-25。

参考文献：

1 [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美]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 吴敬琏等：《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6 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7 钱颖一、肖梦：《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8 张宗新：《融资制度：一个国际比较的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2001（9）。

9 张宗新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风险的生成及化解》，载《经济研究》，2001（10）。

10 张宗新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和风险防范》，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8）。

11 Shaw, E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D. North, 1990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World Bank, 1996 The Chinese Economy: Fighting Inflation, Deepening Reforms,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14 S Grossman and F. Stiglitz, 1958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Efficient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48

15 Levine, and Ross S, 1997.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 and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5(2).

16 Qian Ying Yi, 1993 Lessons and Relevance of the Japanese Main-bank System for Financial Reform in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March

17 J. Stiglitz, A. Weiss, 1981.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 Vol 71.

（作者单位：东北证券公司研究所 长春 130022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Q）

（上接第87页）主性，也就是说，它们也是“个体”，特别是相对于更大的整体而言，更是如此。同样，任何个体也不是一种单独存在的部分，是诸多“关系”的总和，所以个人也就是一个“小宇宙”，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就是一个整体。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温和的个体主义（以传统的个体主义为出发点，吸收整体主义的某些原则）和“妥协的整体主义”（以传统的整体主义为出发点，容纳个体主义的某些原则），以调和两者的对立，当然这两种形式都是不彻底的，因为它们都没有触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相对立的基础。尽管如此，“综合”已形成了一种趋势。因为正如著名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所说：“从分子到人类，直到社会系统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完整的体系，而每一个体系同时却又是更大、水平更高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绝对的部分或整体并不存在。”因此“还原论和整体论，分析法和综合法是互补的理论方法，两者并行。”¹⁹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这种趋势表现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由萨缪尔森等人掀起了“新古典综合”和70年代由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Henry Wallace）等人掀起“理性预期革命”，他们试图把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同马歇尔的个量分析综合起来，严格根据微观假设和微观行为来推演出宏观行为，用微观规律来解释宏观现象。可见，经济学方法论的两派是互补的，两派的对立只是双方在侧重点有所区别而造成的。其实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应是：“从整体着眼，从个体着手。”²⁰

注释：

金观涛：《整体的哲学》，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充分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因此

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的行为。

覃方明：《社会学方法论新探——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载《社会学研究》，1998（2）、1998（3）。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傅琳：《混沌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研究》，载《经济动态》，1994（1）。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文版，6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杨立雄：《瑞典学派的经济分析方法》，载《系统辩证学学报》，1999（7）。

1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杨立雄、王雨田：《物理学的进化与非线性经济学的崛起》，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10）。

10 张宇燕：《奥尔森和他的集体行动理论》，见《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1 [美]詹姆斯·M·布坎南：《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12页，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

12 赵晓雷：《西方经济学对现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载《经济学家》，1997（4）。

13 [美]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4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金观涛：《整体的哲学》，54~62、145~15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6 张雄：《对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2）。

17 [英]L·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中文版，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 胡义成：《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忽视“阿罗定理”》，转引自《新华文摘》，1996（1）。

19 弗·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中文版，33、1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0 1980年首届全球未来大会的口号是“从全球着眼，从局部着手”，在这里我套用了这句话。

（作者单位：北京市民政局 北京 100010）
（责任编辑：N）